

论明前期文学升降盛衰原因

吴志达

如果说整个明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好象是个马鞍形,那么单就明前期文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则呈现出一个陡坡形。即从14世纪中叶元明之际出现新的文学高潮之后,急剧地跌落到低潮,文学冗沓不振达百余年。形成这种升降盛衰现象的原因何在?

一、大动荡的时代呼唤文学的变革

元明之际出现的文学高潮,是与大动荡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的。风云激荡的时代,唤起了作家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促使文学发生变革。

第一,元末的暴政,逼使人心思乱,揭竿而起,而斗争的形势错综复杂,除了农民起义军的反元战争以外,各路起义军之间也互相攻伐。元朝末年,政治更加腐败,吏治愈益黑暗,连职掌纠察百官的肃政廉访使也成了搜刮银钞的市侩^①,赋役繁重,民不堪命;元军“所经之处,鸡犬一空,货财俱尽。”^②反元谣言四起^③,终于爆发了农民起义。14世纪50年代,反元大起义进入高潮。方国珍、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郭子兴、朱元璋、张士诚等相继起义。群雄竞逐,天下大乱。人们的思想也从传统的儒学束缚中解放出来。朱元璋、张士诚幕府,都聚集着一批才智之士,尽管他们的思想状况不尽相同,但就社会思潮的主流而言,是犯上作乱,变革现实,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以仁易暴,摧富益贫,就是当时的时代精神。徐寿辉的天完政权、韩林儿、刘福通的龙凤政权、朱元璋渡江初期的江南政权,就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体现。但因有的农民起义军战略上的失误和内部的互相残杀,以及拥元地主武装还相当强大,龙凤政权、天完政权被覆灭,张士诚、方国珍则受了元朝的“招安”;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之间,都曾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而为朱元璋所吞并。当时现实斗争的复杂形势,与历史上的某些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敏感的文学家很自然地会触发联想,借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反映现实的斗争,成了小说、戏曲创作的风尚。这对于我们理解《三国演义》之类历史小说、特别是像《水浒传》这样的英雄传奇为什么能够在这时产生,以及它们复杂的思想内容,都是有帮助的。当然,这也不只是时代精神的激荡,还有文学内部发展规律、文化积淀等原因。

第二,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中,涌现出具有雄才大略、智勇兼备、欲回天地的英雄人物。时代需要英雄,时代也造就出一批英雄人物,堪为领袖、谋士、大将。朱元璋不愧为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冯国用、李善长、刘基等人是足智多谋之士,徐达、常遇春、傅有德、蓝玉,皆是能征惯战的猛将。朱元璋采纳谋士的建议,取龙盘虎踞的金陵为根本,“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④,并以布衣天子汉高祖为榜样,“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⑤,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久乱思治的心理,“拨乱救世”,以安天下^⑥。又采纳朱升“高筑

墙，广积粮，缓称王”^⑦的战略方针，先后以武力削平南方群雄，随即于1367年冬命徐达、常遇春率师北伐。在北伐檄文中^⑧，虽然含有大汉族主义思想，但是旨在重建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因而势如摧枯拉朽，很快推翻了元朝的统治。1368年，建立了明帝国。随后，次第平定了盘踞在边远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或地方割据政权，全国重新得到统一。这时出现的一批历史小说和英雄传奇，尤其是像《三国演义》这样以描写几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为主、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的长篇小说，尽管有较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文学遗产作依据，但是，明王朝创业过程中产生的英雄传奇故事，现实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为创作这部史诗性的伟大作品提供了宝贵的借鉴^⑨。

第三、传统文化的复苏与作家审美心理结构的变化。在元朝，知识分子很少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因而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儒学，乃至法、兵、农诸家之学，不同程度地遭到鄙弃，其地位远不如释、道。作家的审美心理是畸形的、被扭曲的，往往借历史题材抒发内心的郁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垒块；或从才子佳人、神仙道化、田园山水中，求得精神的寄托、心理的平衡、自我价值的表现。文学如此，绘画艺术也大致类似，以苍郁、狂怪、野逸等不同意象，表现各自的个性，“而不兢兢以工整浓丽为事”^⑩。

到了元末群雄竞起之际，在斗争实践中促使传统文化复苏。才识之士，往往儒法相因，王霸兼施，合纵连横，兵农表里，各尽其才。朱元璋之所以能够较快地成功，在相当程度上，是得力于一批传统文化素养较高的“智囊”。儒学的核心“仁”，得到发扬，对照元朝的暴虐来说，它有极大的凝聚力，不嗜杀掠，纪律肃然，释放甚至使用俘虏或降官，既为人民所拥护，又起了分化瓦解敌人的作用。忠义坚贞等传统道德规范，重新受到重视，这也是朱元璋集团能够克敌制胜的精神因素之一。

伴随久乱思治的社会思潮，审美心理结构也产生显著的变化。人们特别推崇创业之主及其辅翼，赞赏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齐桓、晋文、汉高、昭烈、唐宗、宋祖以及历史上的一些谋臣猛将，被注入新的生命。既崇尚勇武刚烈、粗犷豪放、雄健昂扬、气势磅礴的壮美，也颂扬俊逸儒雅、潇洒倜傥、舒卷自如、刚柔兼济之美。崇拜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才能，超群拔萃、力敌万人的武艺。褒奖仁义忠信，贬斥暴虐奸伪；歌颂善，批判恶；称赞明智，谴责暗昧，态度极其鲜明。如果我们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与宋元时代同类题材的话本、杂剧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审美心理，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雄浑庄重，给人以壮美之感；后者风雅幽默，喜剧性效果较强。王冕、杨维桢、刘基、宋濂、高启等人的诗文，具有激越豪放、雄奇质朴之美，与所谓元代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人高雅温润、柔弱纤细的风格相比，审美意趣也大相径庭。表现在绘画艺术上，元末画家，笔墨更加简逸，甚至用“干笔擦皴，浅绛烘染”，凭意虚构所画对象，用笔传神，不重形似，“纯于笔墨上求神趣”^⑪，这是文艺思潮的一大解放。元季诸家虽画法有别，或笔势雄伟，或幽淡简劲，或奇崛苍茫，而其共同特点，是简淡高古，洗却南宋院体一派工整巧丽之风。这与元明之际出现的长篇小说在人物描写上用夸张性的、粗线条勾画的笔法，侧重人物神态风度和韵致气质的表现，而少作外貌真实细致的描摹与心理的刻画，是颇为近似的。

二、以古典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高潮

元末明初大变革的时代风云，把一大批封建文人卷入了生活的激流。面对严峻的现实，思索社会变乱的原因，探求由乱致治的方法，适应时代的潮流，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尽管

他们的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学体系，却不象程朱理学那样迂腐板滞，空谈“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唯心主义教条；他们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务实通达的，审时度势的应变能力较强，思想不受某种僵化的模式所羁绊，在变革现实的斗争中，发挥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其中有一部分人既是变革现实的政治家、战略家，也是文学家。例如朱元璋的重要谋士、诸葛亮式的人物刘基，就是功业显赫、文名卓著的才识之士。伟大的小说家罗贯中，固然不一定自己“有志图王”，但当天下纷扰之时，又何尝不怀有“龙虎风云际会”之想，不过所遇张士诚非贤明之主，未能展其抱负；施耐庵的生世虽尚难考定，但与罗贯中有密切的关系、有一段共同的经历、思想感情有相通之处，则是可以肯定的。有的作家虽然书生气较浓，缺乏斗争实践，甚至对元朝曾经抱有幻想，但是到了元朝统治已经天崩地解之时，对于重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却是满怀热情的，高启就是这样的诗人。有的作家不愿与元朝统治者合作，有感于世态人情的浇薄，想借助于文艺的特殊功能疗治社会病态，并表示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例如高明及其《琵琶记》。这些复杂的因素和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化，都促使新的文学艺术高潮的形成。

社会的剧变和作家审美心理结构的状况，使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呈现出新的风貌，其基本特点是：改变元后期文学创作上曾经出现的典丽纤巧、雕琢堆砌、内容贫乏的形式主义倾向，崇尚质朴自然、道劲奔放、雄浑豪健的艺术风格，壮美，或者说阳刚之美，是该时期文学的主要审美风尚。题材广阔多样，或取材于历史，或直接反映现实；有写几个政治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历史小说，也有以写农民起义为主的英雄传奇；有表现重大题材的，也有表现家庭生活、儿女情事的；神魔世界的题材亦已有所开拓。由于作家大都经历了社会的变革，观察和体验生活较深刻；或在与元朝统治集团的矛盾冲突中遭到排挤，对社会的弊端及其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因而作品的内容充实，且有思想深度。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功利观念、社会责任感较强，爱憎分明，很少有吟风弄月、无病呻吟、发泄个人情绪之作。作家的个性与群体意识都得到充分的体现，既扩大了文学的社会意义，也提高了文艺的审美价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样式的多样化。在元代已趋衰落的传统文学样式诗文，这时有所回升，诚如《明史·文苑传》所云：“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方孝孺以文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尤其是王冕、杨维桢、宋濂、刘基、高启等人的诗文，真实地反映了大动荡时代的现实生活，艺术上在仿古中而有所创造，“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之见”诗歌成就最突出的是乐府歌行和古体诗，显得挥洒自如，雄健恣肆，豪放奇崛，具有旷放磅礴的凛然侠气。王冕《劲草行》、《吓蟆山》，杨维桢《鸿门会》，刘基《走马行》、《二鬼》，高启《青丘子歌》、《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醉歌赠宋仲温》，颇有唐人气概韵致而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近体诗如刘基《古戍》、高启《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等，固不失为名篇佳什，《水浒传》中英雄好汉所吟唱的歌谣，在豪放粗犷之中更带有几分野气，表现大动乱时代所特有的风貌。宋濂《龙门市凝道记》、《燕书》和刘基《郁离子》中的某些寓言体杂文，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寓意深刻，切中时弊；杨维桢、宋濂、高启的人物传记，叙事紧凑自然，写人妙肖如生，语言浑朴精炼，表现出对英雄志士、奇人异事的赞赏之情。虽然他们大都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更加激化，末代皇朝的黑暗和腐朽，彻底暴露，以至引起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或正义感的文人的愤懑与忧虑，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革新政治的理想，《二鬼》诗还以神话的形象体现了作者重整乾坤的愿望与才能；在明王朝建立之初，歌颂祖国河山的统一，抒发民族自豪感，更是发自内心的真情。

长篇章回小说的产生和南戏传奇剧本的勃兴，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并对后来古典小说和戏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长篇章回小说的出现，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大事，是民族文化厚积薄发的结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以其宏伟的结构、丰富而有现实意义的内容、众多的艺术形象、鲜明的民族风格，提高了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审美价值，标志着我国古典白话小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不再仅仅是“说话”艺人的蓝本，而是专业作家的文学创作。它汲取了历史、传说、有关的话本和杂剧的某些成果，而经过施耐庵、罗贯中等伟大作家的再创作，成为具有统一的主题和严密艺术构思的杰作；塑造出一系列不朽的艺术典型，从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描写中，真实、深刻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体现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在正面形象中，蕴含着强烈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古典现实主义已经达到成熟的程度，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积极浪漫主义的色彩。它们奠定了古典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以及小说艺术表现技巧方面的特色。例如采取章回体的形式，故事性强、首尾完整而富于悬念，艺术上对壮美的追求，人物形象塑造侧重于动态描写和对话，绘声绘色，而纯心理刻画、静态描写很少，某些人物有类型化倾向。这些特点的形成，既与先秦汉魏六朝的史传文学、宋元讲史话本等传统文化有关，也与题材本身的特殊规定性、民族的审美习惯、大动荡时代人们的审美心理结构分不开。

戏曲由南戏逐渐取代了北杂剧的正宗地位，使这次古典现实主义文学高潮更为绚丽多彩。“荆、刘、拜、杀”四大传奇和《琵琶记》的出现，标志着南戏由民间的草台戏向文人创作大型南曲传奇剧本的过渡，在戏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体制趋向规范化，扩大剧本的容量，提高了戏曲的艺术水平。但因作者把戏曲视为宣扬封建礼教、拯救世道人心的有效手段，使剧本带有浓厚的封建说教气味，其中以《琵琶记》最为突出，而它又有高度的艺术性，因此受到朱元璋的赞赏。《拜月记》以金末兵荒马乱的历史为背景，写人民悲欢离合之情，恰与元末大动乱的时代特征相似，且无封建说教意味，真切感人，本色天然，有其艺术魅力。赞扬赵孤大报仇的《赵氏孤儿记》、歌颂苏武民族气节的《牧羊记》等南戏剧本，是与反元大起义的时代精神一致的，曲辞质朴而事悲壮。苏复之《金印记》，写战国时苏秦合纵反秦而佩六国相印，则是当时知识分子想乘时建功立业心理的反映。杂剧虽已衰落，但投身于变革潮流的作家，仍能写出有强烈时代感的剧本，如罗贯中的《龙虎风云会》杂剧，借宋朝开国君臣风云际会的故事，抒自己之胸怀，与《金印记》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而言之，在元明之际大变革的社会思潮、文化传统、审美心理变化等原因的作用下，加上作家经历时代剧变的感受、政治理想及美学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推动了以古典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高潮的出现，在诗文、小说、戏曲等多种文学领域，都产生一批优秀或较好的作品。这次社会大变革，虽然以农民起义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又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基本上是在保持封建制度情况下的改朝换代，而作家的世界观仍属儒学体系，间杂法、道诸家思想，所以，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和审美意识，也较为复杂。

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文学低潮

明王朝建立不久，文学发展情况起了变化，即在一个高潮之后，急骤地趋向低潮。发人深思的一个现象，是在明初经济发展之时，文学艺术却显得萧瑟贫乏，出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状态。这与明初统治者所采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意识、作家审美心理结构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朱元璋出身贫苦，且在灾荒岁月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青年时代参加了农民起义，因此，对人民的疾苦及其愿望有较深切的 understanding，对元朝兴亡的原因、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也有所认识。在他称帝以后，由于受传统的封建帝王思想的影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建立农民政权，但是，对农民也确实作了让步，以缓和封建社会所固有的阶级矛盾。他曾经说过：“夫步急则蹶，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②在长期战乱之后，他采取让人民“安养生息”的方针，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实行许多旨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的措施。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经济上继续推行洪武年间的有利生产发展、社会安定的政策，出现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四境稳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较缓和的“盛世”局面。

明初近70年间，是物质生产发展较快的时代。可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却由元明之际的高潮跌落下来，处于贫困化状态，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呈逆反态势，并没有象唐代那样出现文化上的“盛唐气象”。长篇小说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之后，直到《西游记》出前之前的百余年间，几成绝响。文言小说虽有所复苏，瞿佑《剪灯新话》、李祯《剪灯余话》在文言小说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就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潮而言，传奇体小说也是遭到封建卫道者非议，甚至被禁止的。杂剧则趋向宫廷化、贵族化。宁献王朱权、周宪王朱有燾，先后成为剧坛霸主，他们的创作，在杂剧体制方面有所突破，北杂剧曲谱的整理和理论探讨，颇有贡献，但其剧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已远不及元人杂剧。朱有燾的《诚斋乐府》，大都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宣扬封建伦理或宗教迷信之作；他所写的水浒戏，已与元人同类杂剧的意趣大相抵牾，对义军多有诬蔑之词，鲁智深、李逵等梁山好汉的性格亦被歪曲。南曲传奇有八股化倾向。景泰、成化年间，邱濬撰《伍伦全备记》、邵灿撰《香囊记》，迎合封建统治的需要，上承《琵琶记》说忠劝孝的传统，下开“以时文为南曲”之风，戏曲成了宣扬道学的工具，“非酸则腐”，破坏了戏曲艺术的美学特质。诗文方面，永乐、宣德时期，出现以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台阁重臣为代表的“台阁体”，是歌颂皇恩、粉饰太平、应诏酬答的贵族文学。与科举制度相结合的八股文，更污染士林文风，并影响南曲传奇的创作。

为什么在社会经济由恢复趋向繁荣的时代，文学却从高潮跌落到低潮呢？这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现象，显然不能用上古时代想象丰富奇妙的神话艺术与极其低下的生产水平之间的不平衡规律来解释，它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文学艺术创作是最高级的精神生产，良好的物质条件，对于长篇小说，大型戏曲的创作，固然有促进作用，但是，与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关系更密切的，是需要有比较开明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创作自由的文化思想背景。当然，作家的主体意识、审美心理结构和艺术素养，也至关重要。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环境，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僵化的文化思想，热衷于追求功名富贵的儒生意识，以及雍容冗沓、四平八稳的审美心理，正是扼杀文学艺术生命、导致文艺创作贫乏不振的根源。

首先是封建专制主义恐怖的政治环境，作家失去创作自由的安全感，戕害了文艺创作的活力。明初统治者总结了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大力加强以皇帝独裁为特征的封建专制主义。朱元璋曾严厉地指斥宰相掌大权的制度：“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③洪武十三年，发生了左丞相“胡惟庸案”^④，于是乘机废除了宰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权高于一切，大权独揽的必然趋势，是搞特务统治，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刺探臣僚言行，给臣僚的心理造成一种惶恐感。被征编纂《孟子节文》的钱宰，朝罢归家吟诗曰：“四鼓擘擘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

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翌日朱元璋上朝时对他说：昨天做的好诗！但我并没有“嫌”你啊，何不用“忧”字？钱宰被吓得胆颤心惊磕头谢罪，国子祭酒宋讷“危坐有怒色”的神态，也被特务暗中画成图像。永乐十八年，又在北京设特务机构东厂，与锦衣卫“均权势”，而以宦官担任厂卫职务，作为皇帝的耳目。特务政治给作家的心理罩上了阴影。

其次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背景，对文学艺术所起的桎梏作用。明初统治者在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严重影响文学创作的，是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教育思想以及文艺政策。

《明史·选举志》：“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然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虽有畸重，无偏废也。荐举盛于国初，后因专用科目而罢。”明初百废待举，因此朱元璋广开仕途，网罗人才，有才识而志于仕宦的儒生，大都受皇帝征聘或地方推荐、友人介绍入仕，学校生员也可径入仕途，八股科举又是一条做官的道路。知识分子做官的机会太多了，对文学创作就缺乏激情，得意之士，自然很少有“不平之鸣”。国子监和府、州、县学，所学习的是《四书》、《五经》，兼及刘向《说苑》、御制《大诰》和律令。却把《孟子》中触犯君权、含有民主思想的内容删掉，编成《孟子节文》。并规定条例，“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奴化教育，限制生员干预社会现实生活，既僵化思想，又堵绝了从事文艺创作的源泉，当然也就不可能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

推行八股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文学艺术是个浩劫，带有时代的悲剧性。它把一种反动腐朽的思想意识程朱理学，与功名利禄挂钩，迫使知识分子接受这种思想。八股文的特点是专从《四书》、《五经》中摘句命题，行文内容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疏为依据，“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所谓代圣贤立言，不许自由发挥；形式千篇一律，公式化，从文章的结构、作法乃至格调，都有一定程式，而体用排偶，中间的四段正文，每段有两股对偶文字，故谓之八股。主张“以圣人之文为宗”的宋濂，对这种科举制度也不禁摇头叹息：“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笈，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⑤八股科举制度培养出一批俯首贴耳、头脑简单的腐儒，脱离生活实践，既没有实际工作能力，也不可能文学艺术上有所创造。朱元璋也认为科举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⑥停罢科举十年之久。但从永乐以后，八股科举成了选用官吏的主要方式，将胡广、杨荣等编的《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颁行，指定为生员必读之书，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与科举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皓首穷经，奢谈性理，哪有心思、精力去从事文学艺术的创造性劳动？

对窒息作家艺术生命影响更为直接的，是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朱元璋既把君权神圣化、绝对化，又因其出身和经历养成忌刻多疑的个性特点。他虽优礼儒生，招贤纳士，但又疑忌他们，往往在他们的文字中捕捉挑剔，疑神疑鬼，神经过敏，酿成文字狱祸。他怀疑高启作诗讽刺自己，因而忌恨，后又因高启为苏州知府魏观撰《上梁文》而被株连腰斩。戴良、张孟兼等著名文士也因诗文招忌而被害。至于林元亮、徐一夔、吕睿、许元等人的被杀，只是在替人撰写的表文中，有几个字眼在读音上犯了朱元璋的忌讳，如“作则”与“作贼”、“圣人”与“僧人”、“帝扉”与“帝非”、“法坤”与“发髡”、“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谐音，被认为有意讽刺。^⑦类似此种文字取祸而被残杀者甚多。因而，作者往往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丧失创作自由的环境，心理上有一种惶恐感，这就严重地阻遏了文学艺术创作的生机。

明初的统治者，直接干预文学艺术，朱元璋盛赞《琵琶记》，是正面提倡文艺要为封建主

义服务，同时又采取法律、诏令的形式，把封建专制主义的文艺政策法令化。在《大明律》中，有关于“搬做杂剧”的律令：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象，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此限。

永乐年间，又诏令：“但有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驾头杂剧”，都要烧毁干净，“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⑧

在上述封建专制主义的重重束缚与高压下，使元明之际一度颇为繁荣的文艺创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摧残。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明前期杂剧贵族化、南曲传奇八股化、诗文盛行“台阁体”的原因。这是就影响文学艺术发展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而言。就作者的主观因素来看，是社会久乱以后，出现明前期休养生息、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的盛世景象；知识分子只要愿意为君王所用，不要触犯统治者，取功名利禄并不困难，“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⑨物质生活既然优裕，思想上也就乐于接受程朱理学的统治。因而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对民族与社会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失落了，而伴随封建专制主义而来的特务统治、文字狱祸以及控制文艺创作的律令，又产生了创作的不安全感；无忧患与不安全之间的矛盾，要求在心理上达到自我平衡，表现在审美意识上，追求无冲突的和谐匀称、雍容典雅、平稳工整之美。八股文之逐渐形成严格的程式，“台阁体”诗文之盛行，宣扬封建礼教、神仙道化或歌功颂德的戏曲得以泛滥剧坛，宫廷画院应制的绘画艺术，都是这种文化心理的表现。其共同特点是：作家的物质待遇都很优裕，精神上却贫乏怯懦，大多数都带有御用文人的性质，负荷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从文学艺术的创作，很难产生艺术上有生命力的作品。

总之，14世纪80年代以后，整个文学艺术创作的前进道路，被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所阻遏了，艺术生命被窒息。宋元以来，活跃在都市中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如小说、戏曲的创作，受到更大的限制；封建统治者，不仅用政治力量摧残进步文学，而且把持了创作阵地，使文学御用化。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追求仕进过程中，思想僵化，脱离人民，失去忧患意识，却兼怀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恐怖心理，抑制了真正有艺术生命的文学创作，使文学由一个高潮跌落到低潮，沉寂了百余年之久。

注释：

① 叶子奇《草木子》卷4《杂俎篇》。

② 《元史》卷186《张禎传》。

③ 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引民间小曲《醉太平》。

④ 《明史》卷129《冯胜传》。

⑤ 《明史》卷127《李善长传》。

⑥ 《明太祖实录》卷3 陶安向朱元璋建言。

⑦ 《明史》卷136《朱升传》。

⑧ 见《明太祖实录》卷21。

⑨ 例如《三国演义》中描写“赤壁之战”虽有《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提供的资料，但元末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在战略决策、规模、战术、决战场面等方面，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水浒传》写宋江征方腊的进军路线，与朱元璋讨伐张士诚的路线相同，亦非偶然。

(下转42页)

之心，对一切肆意侵吞他们的劳动成果的腐败现象群起而攻之。假如能辅以政治体制上的成功改革，他们还会竭诚推选出自己信得过的当家人，而毫不客气地罢免那些不愿或不能为他们谋利益的“官僚政客”和“窝囊废”。

当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全部入了劳动者的私囊以后，他们虽不抗税，但税率也必须合理。因此，他们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关心参与国家税政税法的研讨、制订及监督执行，从而使他们成为企业和国家当家理财的主人，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权益。

第五，能够彻底破除统一工资制，砸烂大锅饭，取消国家对消费品的不合理财政补贴，实现国家与个人间的明来明往等价交换，从而有利于分配体制和价格体制的配套改革。不同的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量是不同的，各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也不一样，如果有科学的劳动考核和监督，那么不同企业的劳动者和同一企业的不同劳动者所得到的收入就必然不一样。由此，统一工资和大锅饭就难以存在。在现行的分配体制下，国家对消费品的价格补贴使劳动者的个人实际收入增加了三分之一。^③这种补贴来自对劳动者个人劳动的暗中扣除，又暗中归还了他们。真是多此一举。这不仅不能体现按劳分配，而且严重地阻碍着价格体制的改革。

第六，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企业的生产必然迅速发展，国民收入量必然不断增多，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定能稳定地大幅度地增长。

总之，实行个人所得税制使按劳分配直接了当，使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主义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泾纬分明而又高度统一。应该说它的上述六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可以从农业生产责任制体系中的那种直来直去不拐弯的大包干分配方式的强力效应中得到间接而有说服力的佐证。

注释：

① 《解放军日报·周末增刊》1986年12月13日。

②③ 胡逢吉《关于非按劳分配因素及应采取的对策》《经济研究》1984年第10期。

* 由于不同的企业存在生产条件的差别和价格的不合理等，因此，社会主义企业还存在着级差收益，由此国民不一定是工人活劳动的真实凝结。为了分析的简便起见，这里将这一现实状况抽象掉。

* 对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者来说，是否完全实现了按劳分配，还要取决于对他们劳动的科学计量。

* 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程度，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按劳分配作为他们物质利益的实现，对于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毫无疑问的。

(上接59页)

⑩⑪ 引自郑午昌编著《中国画学全史》。

⑬ 黄佐《南雍志》卷10《谏训考》下。

⑭ 《空坡集》卷7。

⑮ 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32《明初文字之祸》。

⑫ 《明太祖实录》卷36。

⑬ 《明史》卷308《胡惟庸传》。

⑭⑮ 《明史》卷70《选举志》。

⑯ 顾起元《客座赘语》。